

谋道亦谋食：

# 《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

□ 李红涛 黄顺铭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4)04—0016-4

**【内容提要】**本文从“阐释共同体”的视角,对于专业刊物《南方传媒研究》上的“反思性书写”进行个案研究,旨在揭示“南方新闻人”如何建立一套关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的论述。本文首先检视了作为论述主体的作者们的基本职业特征,然后系统分析了话语的三个维度:“体制内外”的二元对立、职业空间,以及大环境下的小空间。本文有助于理解专业期刊在新闻人建立阐释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南方传媒;阐释共同体;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职业是专注于“书写”的行当。一方面,新闻人对于周遭世界进行职业/专业性的书写;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常反身性地书写着自己的新闻传播实践,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反思性书写”。本文从芭比·泽利泽的“阐释共同体”概念出发,以《南方传媒研究》为个案,分析新闻人如何从“实践反思”的角度,在公共平台上建构专业主义的理论论述。《南方传媒研究》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专业刊物,以一线新闻从业者为核心作者群,成员同质性较高,互动相对频繁,因而成为我们理想的分析对象。

学界关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新闻文本和新闻实践,而较少关注新闻人有意识的话语建构。本文将新闻人视为阐释者,深入考察他们围绕个体职业经验、新闻报道个案、新闻业生存发展的公共议题所作出的各种论述,从而试图观察他们如何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表达对微观新闻实践和宏观新闻环境的理解,建立和标示身份认同,以及达成专业共识。

本文关注的问题包括《南方传媒研究》倚重哪些话语主体建构其话语场域?新闻人有意识建构的专业主义话语围绕哪些维度展开?他们如何描绘职业处境、建立身份认同,以及如何阐释媒介体制与市场化等结构性力量对专业运作的影响?他们运用哪些阐释策略,将抽象的专业主义理念落实为中国语境下切实可行的技艺?笔者通过对该刊作者的分析和对文本的细读,试图勾勒这一自发性的专业主义话语场域的基本面貌及其边界,展示新闻人理解专业主义的本地视角以及地方性知识。

## 一、阐释共同体与新闻专业主义

芭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新闻研究框架一味地视新闻

人为专业人士,忽略了他们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共享话语的集体之成员,由此提出“阐释共同体”的研究框架。她强调,尽管阐释实践无处不在,然而这一框架对于分析围绕那些攸关新闻业专业地位的事件而产生的话语尤为有力。无论是水门事件、麦卡锡主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斯蒂芬·瑞斯所说的日常危机,都足以成为阐释的“热点时刻”。在理解和阐释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新闻人得以划清专业实践的边界,解决悬而未决的议题,从而修补新闻范式或者提升新闻业的社会地位。

新闻人的阐释活动,更多地体现为对专业主义理念的日常更新与强化。不过,这种话语实践之于中国新闻人的意义,似乎并非对专业主义的“常规书写”,而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定义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有关文献已经揭示出这种话语实践所蕴涵的复杂性。陆晔与潘忠党最早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碎片化、局域化呈现方式,童静蓉也认为,中国新闻业并不存在单一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而是机构话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三套话语体系同时并存。即便是在同一性较强的市场化媒体内部,对于专业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研究者也试图从“阐释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新闻人的专业观念。林功成对记者博客与手记等阐释形式与活动进行研究,探讨新闻人如何界定“何为好记者”以及“何为好新闻”。李艳红聚焦邓玉娇事件这一“热点时刻”,分析新闻人如何通过专业刊物、个人博客等平台,来反思媒体实践以及为新闻事实原则赋予新的维度和内涵。这些研究表明,新闻记者们在诸多场景之下,通过各种形式建构阐释共同体,培育和达成专业共识。而在本文中,我们将深入剖析专业刊物在建构阐释共同体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南方传媒研究》是典型的业界刊物,自2006年创刊以来,一直采

**【作者简介】**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阐释共同体”阶段性成果,编号:13YJA860011;同时受到浙江大学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平台资助。

取“以书代刊”的形式。由于它未进入学术评鉴体制,反倒令其得以保持鲜明的“实践反思书写”风格,从而为我们分析新闻人对于专业主义的“自主言说”提供了理想的素材。

## 二、谁在说话

在具体检视《南方传媒研究》所建构的“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个“谁在说话”的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描述作者的所属机构、职业身份以及核心作者群,来勾勒该刊话语主体的基本特征。2006至2011年,该刊出版33期,发文1105篇,期均33.5篇。合著的情形比较罕见,因此我们只分析独立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身份信息。

第一,在所属机构方面,文章作者来自于140多家机构。其中媒体机构占85.1%(940篇),学术机构占12.5%(138篇),其他机构只占2.4%(27篇)。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由新闻从业者主导的学术话语平台。进一步分析发现,作者高度聚集于“南方”。这里所说的南方具有多重含义,而且每重含义都很重要。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在标明机构信息的1081篇文章中,来自广东省的文章占75.8%。二是机构意义上的南方,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文章作者占67.4%。三是组织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南方,现任及前任南方报人的文章占发文总量75.3%。

第二,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内部,各成员单位的发文数量很不均衡。在现任南方报人发表的745篇文章中,《南方都市报》遥遥领先,占25%;《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次之,分别占15.6%和15.3%;其他几个发文数量较大的单位依次是《21世纪经济报道》(8.3%)、南方报业传媒集团(7.3%)、《南方人物周刊》(4.8%)、《南都周刊》(4.3%)。上述七个单位发文数量的不均衡,折射出他们在《南方传媒研究》话语场域占据的论述位置之不平等等。

可以肯定,论述位置是多种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在媒介的“先赋角色”方面,《南方日报》具有广东省委机关报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母报”两重先赋角色,使得它在《南方传媒研究》话语场域之中能够取得优势性的论述位置,可见该刊物是在尊重中国传媒业的基本结构性逻辑的前提下,来建构其实践反思性话语场域的。在媒介的实际表现方面,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广告收入,《南方都市报》都表现突出,也许正是这一备受瞩目的“自致角色”,使它能在《南方传媒研究》话语场域之中雄踞首要的论述位置。在话语的影响力方面,市场化和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今中国新闻业的两大主流话语,而《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皆高举市场化旗帜,努力探索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因而它们都能在《南方传媒研究》话语场域之中占据重要位置。《南方传媒研究》似乎也在有意识地分配给《南方都市报》更多的话语权,试图将其塑造为中国新闻场域之中的意见领袖。

第三,在文章作者层面,《南方传媒研究》前33期的1105篇文章,出自570位作者之手。其中94位作者发文在三篇及以上,占文章总数的48.6%;有38位作者发文在五篇及以上,占文章总数的31.9%。在发文数量最多30篇、最少8篇的前15位作者中,有12位是现任及前任南方报人。我们将这15位作者视为《南方传媒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其中

包括支庭荣和张志安两位学者。核心作者群中的12位现任/前任南方报人,都有扎实的新闻业务功底,而且绝大多数都有新闻调查、特稿或者时评等领域的从业经历,其新闻人的职业底色鲜明而浓厚。

通过分析话语主体,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南方传媒研究》主要通过倚重三重话语主体来建构其实践反思性的话语场域。一是在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大环境里,倚重“南方”的新闻人;二是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小环境里,分配论述位置时既尊重集团内部基本结构性逻辑,也倚重媒介表现突出的成员单位;三是在集团小环境里的人力资源层面,倚重业内外富有声望、有可能成为“角色模范”的少数新闻精英。

## 三、体制内外与身份认同

对于体制内外的讨论,成为新闻从业者专业主义话语的重要起点。在南方新闻人看来,中国媒体行业的分类标准最为复杂,呈现出“纷繁复杂与精神分裂”的局面。不过,有些人试图以“体制内外”的二分法来解释这种复杂性。

南方周末的某位记者,和许多中央媒体记者一起去集体采访报道一个正面人物。结果他发现,他和体制内的不少同行,几乎无法交流,说话方式不一样,思维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生存方式不一样,所谓体制内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和两个世界。

在这段描述中,体制内外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差异之大,以致“几乎无法交流”,而“体制内”主要是指党报和党台。一些新闻人对“体制内”的批评,是基于自己在其中的从业经历,他们往往把“体制内”描绘成职业生涯的“低点”。例如,罗昌平这样描述曾供职过的一家“带有典型事业单位特色的弱市场化媒体”——那里既无系统的新闻技能培训,也无职业操守的界限。而沈亚川也将自己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历描绘成“夹缝里左冲右突疲于奔命的生活”。

与“体制内”相对举的,通常是市场化媒体。谢海涛将自己“从体制内逃离”之后加盟的《南方都市报》描绘成“群魔乱舞的体制外生态”;“真正接受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就是于此种棒喝、受虐中开始,一点一点剔去内地宣传思维方式,有剔骨之痛,似乎也受教无穷”。概言之,在批判、拒绝或者逃离“体制内”之后,南方新闻人将市场化媒体视为与“体制内”分庭抗礼并实践专业主义的栖身之地。

事实上,“体制内外”这种二分法有着根本性的论述困境。因为就算是市场化媒体,也“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依然戴着紧箍儿”。首先,市场化媒体也受惠于“传统体制的优势”,比如刊号资源以及其他媒介政策的庇护。其次,市场化媒体的日常新闻实践,同样受制于宏观新闻体制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再次,在人事和产权等方面,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与体制内媒体其实并无本质差异。浸淫于体制当中的新闻人,对于这种论述困境自然深有体会,因此在“体制内外”的大框架之下,南方新闻人收缩共同体的半径,试图在两个层面上建立另类的身份认同。

第一个层面,将认同收缩于特定媒体机构的门墙之内。这突出表现在《南方传媒研究》配合南方报业六十周年而推出的“南方基因”专辑。在近200页的篇幅中,集团领导、一

线记者编辑以及前任南方报人 纷纷阐释他们心目中的“南方特质”或者南方“小气候”。“南方”不仅被当作有实质内涵的认同对象,更被打上某种职业精神的特殊烙印。这些论述彰显出南方报人的自我期许——被当作共同体的南方报业,不仅迥异于“体制内”,也有别于其他市场化媒体。其实,这种典型的“仪式”时刻洋溢出来的对于组织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仍然有着论述上的困难,因为南方报业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内外”的混合式组织架构,这必然意味着“南方”小气候里面还存在着不同的亚气候。

第二个层面,逾越特定媒介机构与媒体类型的划分,培育同人式的认同,突出表现在调查记者或深度报道记者的圈子。傅剑锋认为,调查记者形成的小圈子,构成职业共同体的萌芽,因为他们共享“难度很高的较为一致的训练或从业经历,……有共同的外部压力与威胁,……有初步的共同利益、伦理标准与价值标准”。调查记者散落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和不同地域的媒体当中,而同人式的认同建基于职业旨趣与专业实践,“深度记者们的共识,已在突破体制内媒体与市场类媒体的界限”,这也为建立某种超越媒体机构甚至是媒介类型的认同提供了可能。

#### 四、职业空间:“寻租者”与“青春饭”

大多数处在体制与组织所搭建的劳动环境之中的一线新闻人认为,新闻工作首先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有的时候,他们的劳动状况会被两类事件所恶化或污染:一是伤害记者人身与职业安全的事件,二是重大的“新闻寻租”事件。以这些事件为契机,新闻人对劳动环境与职业空间展开反思,展示他们对于传媒体制与市场化等结构性力量的辩证理解。

显然,新闻寻租事件具有“合法性危机”的意味。面对这一危机,新闻人必须明辨是非、给出解释,以便维护或修补职业正当性。在南方新闻人的论述中,新闻寻租并非市场化导致的恶果,而是新闻体制行政化之祸。他们发现,新闻寻租的“作恶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媒体,而非市场化媒体。例如,在2008年发生的记者受贿或封口费案中,被抓记者所属媒体大都处于“二线”,而“为公众所推崇并尊敬的几家市场化程度、职业操守相对较高的新闻媒体,目前尚无一例”。因此,“完全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其职业操守要比完全体制内的媒体要好”。戴志勇也认为,“越市场化,职业共同体感觉越强烈的单位,腐败的程度越低”。

在南方新闻人看来,体制内媒体之所以成为新闻寻租的重灾区,主要在于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以及更加宏大的媒介体制。他们将这种缺陷概括为“被曲解的市场化”,或者说“变异的制度环境”。罗昌平文章《拆解“新闻寻租链”》开出的药方是:“打破权力部门对新闻的寻租链条,并举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即新闻运作与经营业务的分离。”傅剑锋文章《三鹿事件前传:我来剥媒体的皮》指出:“媒介体制上走向真正的法治约束下的市场化改革,即让媒体抛弃计划时代留下的恶,并以法治的方式制约市场化之下的恶。”

此外,新闻人也借职业安全等议题,检视中国记者的薪酬水平与职业空间,探讨新闻职业化的路径。在《南方传媒

研究》第26期“记者共同体”专辑中,甚至专题讨论“记者防身术”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第32期“职业空间”专辑则全面检视中国记者的薪酬水平与职业上升空间,并触及记者职业化这一议题。我们注意到,这类检视和反思始于同事或同行的跳槽或转型。

大多数离开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归纳起来,南方新闻人对于薪酬体制与职业空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采编人员的薪酬,远低于媒体内的广告经营人员;二是市场化媒体普遍采用底薪加稿费的薪酬架构和数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令新闻人为“挣工分”而疲于奔命,既导致了粗陋的新闻生产,也阻塞了新闻人的业务上升通道和职业发展空间;三是媒体人职业生涯容易出现“天花板效应”,不仅收入难以增长,位置也难以上升,进而导致新闻业成为一碗“青春饭”。

许多新闻人将职业空间的逼仄和媒体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归咎于包括市场化媒体在内的媒介体制问题。褚朝新文章《一线记者能干几年》认为,部分媒体虽然经营状况良好,但却无法给采编人员加薪,其原因是“市场化媒体不市场,自己赚的钱怎么花自己说了不算”。林楚方在《做事不是你想象》文章中,以自己的媒体从业经历来说明:“中国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最大的问题就是机制问题,机制问题核心又是激励问题,激励问题核心是产权问题。”赵何娟文章《中国记者职业化之路尚未启程》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与政策环境之下,中国记者职业化之路不是太窄,而是尚未启程。

#### 五、大环境里的小空间

如何在现有新闻制度和政策的大环境下,拓展出新闻实践的小空间,追求专业主义技艺,显示出新闻人谋求“专业化”的现实选择。南方新闻人的专业主义论述视界颇为开阔,从一则报纸封面广告到一幅新闻图片,从“年度记者”的自我讲述和他人评说,再到针对特定新闻操作的辩论,都在辨析“何为好新闻”“何为职业记者”的精髓,框定专业主义的边界,探索其具体状貌,借此来培育职业共识。

##### (一)狭义的新闻专业主义

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公共服务、独立性、自主性等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容易流于空论。南方新闻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历史地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者拥有相似的悲叹:他们的上限是被设定的,这让他们达不到专业主义的最低要求,比如先天匮乏的独立地位……就它的不可实现性来讲,新闻专业主义是大陆新闻人的乌托邦……虽然有人深切怀疑在一个处处受牵制的环境中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性,可除此而外,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坠入无聊?

尽管他们不断感叹新闻人不乐观的专业处境,然而许多人却仍然强调在既有的大环境下追求专业主义的重要意义。入职不久的记者方可成撰文《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认为:“只有专业主义才能帮助我们迅速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免于被伤害。”赵何娟文章《中国记者职业化之路尚未启程》也指出:“在缺乏外在保护的坏环境下,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正是化为内在动力的职业化。……职业化规范的形成,新闻专业主义是其实现路径。”宋志标文章《忧郁的

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在目前还不具备追求那种全面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条件下,新闻人应务实地去期许和追求一种“狭义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是说,在独一无二的国情下确立坚定的专业标准。

### (二)向理想主义告别

南方新闻人的论述,也显示出他们对于从理想主义到专业主义这一转变的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理想主义色彩逐渐开始褪去,而专业意识则相应抬升。不少论者都拿90年代中后期与当今新闻界进行比较。例如,朱学东文章《平媒告别英雄时代》概括其间的变化:“少了英雄,却增加了更多更专业更现代的媒体……告别的过程,也是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获得青睐的开始。”曾繁旭在《衰落的新闻理想主义》一文中,也对两个时期进行对比,并感叹这个职业变成一个特别日常的工作,大家使用越来越多的词汇是“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不过,有些人并不认为理想主义的式微是什么坏事。南都编辑卢斌在《日报深度新闻编辑的中间道路》一文中宣称:“相比沦落成一个养尊处优的理想主义者,本人更愿意朝着一个信奉专业主义的职业新闻人努力。”

### (三)安全运作与空间突破

在告别理想主义之后,南方新闻人不再一味强调与体制冲撞,转而寻求以“安全生产”为前提的空间拓展。事实上,这也构成他们日常实践与自我反思之间的最大张力。一方面,新闻人特别是新闻主管或报社领导强调,安全生产是维持媒体运行的一个大前提。资深媒体人朱学东在《最难的是坚持》文章中说:“在一个复杂的职业环境中,我一向恪守时代允许的表达方式。”但另一方面,一线新闻从业者似乎更强调风险控制和空间突破。沈亚川文章《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认为,在比较敏感的题材上,要将“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纠缠之间”。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某些中层新闻主管的论述当中。例如,《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总监左志坚在对玉树地震灾区采访报道的反思中,一边为某些夭折的选题而惋惜,一边则强调在地震等特殊时期,由于存在着比较大的外部干扰,前方在设置选题时必须不时和后方保持通话,避免将采编资源浪费在无法见报的选题上。

### (四)对独立性的重新阐释

在强调传统的媒体独立性理念之外,南方新闻人也强调媒体相对于外部舆论的独立性。这些阐释具有两重基本的论述背景。一是近几年新媒体事件的频发,以及网络民意的推波助澜,令新闻生产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二是民粹主义或者在民粹包裹之下的精英主义,成为某些市场化媒体的话语策略。在这两重背景下,南方新闻人试图在两个层面上阐释媒体的独立性。首先,他们认为在新闻事件尤其是民意沸腾的新媒体事件中,记者的采访活动及其报道不应被“民意”所左右。在反思邓玉娇事件时,龙志撰文《邓玉娇案,一个记者的立场》认为,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弱者会天然地被公众同情,黄秀丽文章《警惕媒体与民意的断裂》指出,在触动敏感社会神经的事件中,网络民意往往带有粗糙和非理性的特征。因此,沈亚川提醒媒体人不要被网络民意所挟持,而应坚守冷静观察和客观记录的专业本分。

对于南方新闻人而言,独立性还意味着不应过多地作为“为民立言”作为正当性的根基。换言之,媒体应舍民粹主

义,而将专业主义作为争取正当性的资源。在围绕“小学生卖淫案”报道的专题讨论中,彭晓芸文章《面对迷案,真相如何可能?》指出,中国媒体界“有一种弱势群体浪漫主义迷思”。龙科文章《社论写作的体制焦虑与政治正确》指出:“不加反思地以民意发言,只能在媒体内部构成另一种隐蔽的政治正确性。”其结果是,在强势与弱势之间“选边站”的冲动,压倒了媒体对于事实的呈现和对于公共议题的深入探讨。沈亚川文章《专业的才是客观的》强调,媒体的独立性意味着“完全没必要为反对而反对,不做体制的喉舌,并非就一定要做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喉舌”。

### (五)专业主义的技艺

在微观层面上,南方新闻人强调要努力将抽象的专业主义理念,落实为具体新闻实践当中的切实可行的技艺,因此高度强调“文本”和“技术”(或方法论)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新闻界在“技术”层面的匮乏。傅剑锋文章《平衡报道不能屈从于网络民意》指出:“我们不缺责任感,但我们缺技术。”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出于一种更实际的生存考量。南方新闻人认为,面对新闻生产复杂的外部环境,专业主义为新闻人提供了一种保护策略。调查记者陈小莹和衣鹏在《新技术背景下的财经新闻调查术》一文中指出,新闻报道各类风险居高不下,因而对新闻文本的“证据”要求在加码。调查记者王克勤在《对调查性报道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说,由于被监督对象会努力寻找报道中的任何纰漏,因此记者“为了保护自己,也要做得更加专业。严格来讲,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逼出来的”。

在建构专业主义技艺的过程中,调查记者被视为专业主义方法论的界定者和标杆。宋志标文章《忧郁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虽然广义的新闻专业主义遥不可期,但狭义的新闻专业主义还可以在调查报道那里寻求突围。对于专业主义技艺的讨论,在《南方传媒研究》第27辑围绕“调查报道”的专题讨论中得到充分展现。这些技艺涵盖颇为广泛,包括如何做好突发事件报道的后勤保障、如何进入新闻现场、如何接近核心信息源、如何对各种信息进行交叉比对,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获取信息、如何报道“事实”和“真相”等等。这些方法或策略清楚地表明,对于专业主义技艺的重视和追求,已经成为南方新闻人专业共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 六、结语

本文从“阐释共同体”的视角,以《南方传媒研究》为个案,分析南方新闻人如何通过有意识的“自我言说”,来阐发他们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我们认为,在专业刊物上展开的阐释活动,其意义在于对内凝聚新闻人的职业和专业共识,对外建立文化权威和争取职业/专业正当性。

《南方传媒研究》主要通过倚重三个话语主体,来建构其实践反思性的话语场域。一是在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大环境里,倚重“南方”的新闻人;二是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小环境里,分配论述位置时既尊重集团内部基本结构性逻辑,也倚重媒介表现突出的成员单位;三是在集团小环境里的人力资源配置上,倚重业内外富有声望、有可能成为“角色模范”的少数新闻精英。

(下转第28页)

这个项目早在 2011 年 5 月就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此次群体性事件是因为有人捕风捉影地宣传,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引来群众围观。

什邡政府方面的压制策略,实际上是将抗争者的话语边缘化,尝试摧毁他们的合法性集体解释和身份认同。但社会化媒体的运行,使得这套压制逻辑未能奏效。第一,压制带来双方冲突的直接场景,被社会化媒体快速传播,大量图片和煽动性的语言受到网民广泛关注,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第二,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中,将抗争者定义为包藏祸心、别有用心的人,引起市民反感,导致事态激化。

2、市民的反弹。自从警方强行带走 27 名抗争者开始,什邡市民的抗争行为便走向极端,警民双方于 7 月 3 日发生暴力冲突。笔者研究发现,此次群体性事件冲突升级,与事件网络舆情的的发展基本同步。从微博表达的内容来看,网民对直接压制和官方劝导均有热烈的讨论,从而唤起更多的怨恨情绪,推动抗争行为走向暴力化。自警民冲突开始,“暴力”和“警察”成为微博内容的两个关键词。搜索 7 月 1 日至 3 日的微博转发及评论,涉及“什邡警察”的内容共有 270272 条,其中转发及评论数量最多的一条微博,是 7 月 3 日警民暴力冲突的现场描述:人山人海的市民正在什邡市委聚集,要求放人,要求放人;9:30,我无法预计什邡市委门前聚集了多少人,目前我们无法知道,被抓的同胞受尽了多少艰难;9:40,所有群众原地坐下;10:20 左右,多名什邡警察把一名中年人当场打昏迷!伤者已经火速送往医院;10:35,防暴警察再次冲向人群。

网民微博除了文字报道,还有冲突现场的视频,呈现什邡警察使用震爆弹和催泪弹的过程,同时发布警察使用武器伤害抗争者的图片。没有亲历冲突的大量网民被迅速动员起来,他们对什邡市民深表同情,对地方政府的压制行为表示愤慨。

钼铜事件激化后的网络舆论话题发生改变,人们讨论的焦点从“项目是否会造污染”和“要求项目停建”转变为“要求立刻放人”。在线下的抗争中,行动者的目标也从抗议钼铜项目变成抗议政府压制。在微博营造的热烈氛围中,什邡市民变得更加团结和激进,抗争者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

越稳固。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劝导和压制非但不能控制局面,反而激起抗争走向暴力化。

#### 四、结语

在环保抗争事件暴力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化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抗争事件前期,微博平台的信息扩散,给民众造成恐慌心理,地方政府的回应失效,则激发人们的怨恨情绪,并塑造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受害者身份。由怨恨情绪和外部围观激发的崇高感,使得大量网民与意见领袖从中立角色转变为激进的抗争者和支持者,促使什邡市民进行动员并最终走上街头。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劝导与压制,非但不能取消抗争行动者的合法性,反而触发抗争行动的激进化,暴力抗争的拐点就出现在直接压制之时。在事态激化的过程中,新一轮的微博平台怨恨动员,改变了抗争的性质和诉求,导致地方政府虽然宣布停建钼铜项目,但依然无法阻止暴力冲突的发生。本文关于社会化媒体与环保群体性事件激进化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方式进行反思,从而为今后妥善处置类似事件提供一些启示。■

#### 参考文献:

- 谢耘耕主编:《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 [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李义中、屈平译:《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
- Jia Dai, "Deliberat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A Study of Hotspot Internet Incidents".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11).
- 喻国明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
- 燕道成主编:《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研究》,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
- 曾繁旭、黄广生:《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开放时代》2012 年第 4 期。
- 殷宪龙:《什邡 开往春天的经济动车》,《德阳日报》2012 年 5 月 15 日。
- 《四川什邡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钼铜项目正式开工》,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2012-06/30/15683995-0.shtml>, 2012 年 6 月 30 日。

Reese, Stephen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4): 390-409.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 年第 7 期。

童静蓉:《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 年第 1 期。

陈阳:《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国际新闻界》2008 年第 8 期。

林功成:《新闻从业者如何使用博客:博客对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影响》2010 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论文。

李艳红:《作为反思性话语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线“民意”、被裹挟的新闻报道与事实原则的新阐释》,第三届文人论政学术研讨会,香港城市大学 2012 年 4 月。

石扉客:《反暴力是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南方传媒研究》2010 年第 26 辑。

傅剑锋:《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2010 年第 26 辑。

(上接第 19 页)

南方新闻人实践性专业主义的话语,包括三个核心命题。第一,实现专业主义的路径,是在新闻业内部建立或培育一个坚硬的内核,以少数市场化媒体的专业实践为范本,由此向外推展。第二,实现专业主义的主要障碍是体制,只有建立真正的市场化机制,才能推进职业化和专业化。第三,在当前大环境下,不谋求整体性的专业主义,而是着力拓展小空间,聚焦于各种专业主义的技艺。

我们将《南方传媒研究》建构的这一整套话语,称之为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它以新闻劳动者为核心,立足于新闻实践的职业性,在当今中国力求拓展专业主义的实现空间。■

#### 参考文献:

- Zelizer, Barbie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3): 219-237.